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要完全地重返云南文学的70年发展历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事文学评论的写作者,只能时而重返文学的密林,时而腾飞于密林的上空,在记忆中寻找那些闪光的珍珠,用长焦镜头摄取那些更为耀眼的珠玉,有些宝物被遗漏与被遮蔽是必然的。

云南新文学也并非只有70年,五四新风吹过云南高原时,云南新文学就已经诞生。在中国新诗诞生初期,云南就有年轻的柯仲平、陆晶清、梅绍农等诗人开始创作,并在后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抗战爆发,风流云散的京派作家、生不逢时的现代诗人在颠沛流离中来到昆明,他们把当时中国的优秀文学带进了云南,并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自上世纪初到40年代末,云南文学逐渐形成了“边地与民族”、“城市与现代”两个传统,它们之间的交融与碰撞、勃兴与隐蔽,构成了云南新文学的变迁史。从1949年至今的70年云南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承续与发展。这70年的云南文学,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也集中体现出一些显著的共性特征。

作家群的涌现

“作家群”现象是云南当代文学一个显著的特征。

当新中国的太阳冉冉升起,阳光普照云岭高原之初,云南文学也迎来了一个美丽的早晨。随着解放军大军入滇,高原上首先蓬勃生长起了一批部队作家,他们后来被称为“云南军旅文学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以冯牧为领军人物,汇聚了一大批年轻的部队作家、诗人,白桦、苏策、公刘、彭荆风、林予、周良沛、公浦等都是在那时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冯牧的率领下,千里走边疆,深入边塞、哨所,边走边写边讨论。丰富的边疆生活为他们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为云南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面貌。翻身解放、社会进步、民族平等成为这一代作家基本的思想背景。他们抒写边疆少数民族苦难的历史、落后的现状、翻身的喜悦,描绘祖国西南边陲的美丽风光、浪漫风情。由于他们长期深入边防、哨所,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革进程,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活非常熟悉,他们不自觉地就写出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他们创作的一些小说很快被改编为电影,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从这批军旅作家身上,可以看到“作家群”的一些特征。作家群是一个“准流派”的概念,它是一些作家由于某些原因以不同的方式汇聚到一起,在创作上出现了某些相似的特征,在一定的时段内以群体的状态出现于文坛。他们有大致相近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段,大致相同的关注领域、价值趋向。同时,还必须出现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继“云南军旅文学作家群”之后,云南可以称为“作家群”的至少还有三个:一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二是90年代开始出现的“小凉山诗人群”;三是在新世纪广受关注的“昭通作家群”。

上世纪80年代,云南文学发展迎来了又一次创作新潮。在这个潮流中,出现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沈石溪、吴然、乔传藻等作家为代表,形成了“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他们的作品淡化了“宣教”传统,强调以追求真善美为原则的趣味性,并且将云南的边地风光、民族风情融入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写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无论是童话、散文还是小说都充满了童心童趣。沈石溪更是将动物小说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他写的是动物世界,观照的却是人的世界,人性的种种在他笔下的动物中呈现出来,读他的动物小说,也可以看到人世间的丑恶与良善。

“小凉山诗人群”以鲁若迪基、曹翔、阿卓布林、黑羊等诗人为代表。在这个诗群中,发表过作品的有数十人,大多都很年轻,沉迷于诗歌创作。他们长期生活在小凉山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诗人,作品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他们抒写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变迁、心理变迁——

■ 综述

70年来云南文学的五个特征

□ 宋家宏



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渴望与隔膜、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冲击时的焦灼与无奈、对本民族的深沉之爱等。风情与民俗在他们的笔下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呈自然的状态。他们的作品已经有不少走出了小凉山,几位诗人获得了全国性的奖项。

“昭通作家群”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在新世纪之后受到广泛关注。这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作家群,由一批昭通籍的作家、诗人构成。他们所处地域的贫困与文学创作的繁荣构成巨大的反差,这一现象被称为“昭通文学现象”。可以说,昭通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生生不息,他们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全国知名刊物上,一些作品产生了广泛影响。夏天敏、雷平阳、胡性能、潘灵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作品大多以现实主义精神价值为核心,关注底层,关注民生,抒写苦难中的人生价值,是一个以写实性为基本特征的作家群体。昭通作家群受到良好评价,是因为他们直面生活的勇气,以现实主义精神书写人与环境的抗争、与命运的抗争。

多民族文学的繁荣

多民族文学的繁荣是云南文学70年的一个重要特征。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这些民族在70年前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经济水平、不同的文化发展现状,但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学则是云南各民族都拥有的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民族平等是党的基本政策,党和政府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繁荣。一些原来只有民族民间文学、没有作家的少数民族,经过数十年努力,都有了各自的作家、诗人。云南在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繁荣方面成绩显著,迄今为止,云南所有少数民族都有了各自的作家作品,并且所有少数民族都有人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在云南多民族文学创作的庞大队伍中,有的作家作品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李乔,这位彝族作家文学的拓荒者,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以他的长篇三部曲《欢笑的金沙江》蜚声海内外。晓雪、张长、杨苏、张昆华、李钧龙、普飞等作家也以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诗歌、小说、散文引人注目。从西藏到云南的丹增在小说、散文创作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存文学、潘灵、哥布、和晓梅等相对年轻一些的作家、诗人,在民族文学创作中也有新的拓展。

云南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对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处于“边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充分发挥文学作品建构民族国家想象和认同的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云南边地文学中的许多文本,通过重构民族历史记忆与描绘边地的新貌、光明前景,在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汉族作家也以平等的眼光观照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

实,在重构民族记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少数民族作家则进一步拓展了重构历史记忆、促进民族团结的文学空间。

白桦、彭荆风、苏策、公刘、周良沛、柏鸿鹤、王松等汉族作家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为云南文学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80年代以后,黄尧、张曼菱、汤世杰、范稳等作家书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在重构民族历史记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他们的作品在如何写好民族题材作品方面做了很好探索,深刻地影响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

庞大的女作家群体

女性文学创作逐步繁荣,是云南文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回望70年的历史,各民族女作家在云南从无到有,逐渐壮大,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

1949年以前,云南新文学中女作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如陆晶清、李纳、赵银棠等。1949年以后,妇女翻身解放的浪潮席卷大地,云南女作家中,女作家的身影逐渐增多。电影《五朵金花》编剧之一的赵季康,同时也写小说、散文。柏鸿鹤1949年即出版了散文集《无影灯》,直到进入90年代后,她才开始了长篇作品的创作,200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风雨红颜》。冯永祺擅长散文创作,出版过多部集子。曾参与《阿诗玛》收集整理刘琦,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进入新时期,云南女作家就更多了。在上世纪80年代即产生影响的女作家有严亭亭、张曼菱、何真、董秀英、景宜、先燕云、黄晓萍、彭鸽子、陈约红、白山等。这一代女作家们曾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等,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在她们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她们更多地关注时代、社会与个人的关系。80年代的文学新潮,给她们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与上一代作家专注于书写边地与民族题材不同,她们的创作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状态,群体特征不明了。她们在80年代写出了有影响的作品,进入新世纪后则走上了不同的创作道路。

张曼菱曾以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产生过很大影响。进入新世纪以后,她主要从事影视创作和散文、随笔及报告文学的写作。严亭亭的小说和影视剧剧本在80年代很有影响,后来远走异国他乡了。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英年早逝,是云南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损失。何真以鲜明的女性意识进行小说创作,新世纪转入长篇散文和影视创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黄晓萍歌颂禁毒英雄罗金勇及其妻子罗映珍的报告文学《真爱长歌》受到读者的好评。先燕云的几部长篇报告文学完整地抒写了褚时健从“烟王”到“橙王”的传奇人生。彭鸽子写小说和散文,她的长卷文化散文《走进司岗里腹地》,是作家多次深入佤山、深情注目佤族人民生活的结果。回族作家白

山对历史题材情有独衷,她在新世纪后重新修订再版了写于上世纪的《血线——滇缅公路纪实》,在云南的抗战文学热潮中产生了影响。在80年代以小说创作立足于云南的陈约红,新世纪以后以散文和儿童文学创作为主。

进入90年代后,女作家更成为一个显著的存在,如海男、黄玲、王坤红、黄豆米、段瑞秋、杨鸿雁、叶多多、杨浩、黄雁、玛波、马丽芳、贾薇、夏吟、蔡晓玲等。这一代作家与之前的女作家们有明显的区别,她们在一定时期里以展示自我丰富的心灵世界为作品的主要内容。当然,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在她们作品中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内容。

王坤红的作品与边地、民族等元素几乎毫无关系,笔下出现的都是都市中人的欲望以及生存、情感的困境。黄玲在创作与评论两方面皆有收获,她的文学之旅开始于90年代,但是进入新世纪后似乎才迎来了自己的高峰期。在评论方面,《李乔评传》《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妖娆异类——海男评传》等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创作方面,几篇写高校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在新世纪高校题材作品中别有特色。回族作家叶多多新世纪以后把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散文创作中,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杨鸿雁致力于小说创作,她曾专注于都市女性题材,尤其是都市男女的婚姻与爱情,聚焦她们在情感生活中的困惑、迷茫与挣扎。

新世纪以后,更为年轻的一代女作家登上了云南文坛。现在,她们的创作势头正旺。和晓梅、汤萍、艾栗木诺、唐果、单增曲措、袁智中、闻冰轮、彭黛英、永基卓玛、央今拉姆、任洋、伊蒙红木、乔丽、晓蕊等是她们中的代表。这一代云南女作家,少数民族的居多,绝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广阔的创作视野,试图从民族与地域的写作中探寻人类精神价值的共同性。例如,和晓梅对纳西族女性命运的书写,伊蒙红木对佤族历史与文化的追寻,永基卓玛和央今拉姆对云南藏区的书写,都呈现出与过去全然不同的新意。

云南成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镇

新世纪之后,云南的诗歌创作成为全国的一个重镇。这又是体现云南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现象。

云南是诗歌创作的理想之地,神奇美丽的自然风光、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以及随同社会历史变迁而发生的多民族历史性生活巨变,激荡着诗人们敏感的心灵。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刘、白桦、周良沛、晓雪等诗人就把神奇美丽的云南在他们的诗中描绘得引人入胜。在80年代初,云南的诗歌创作由沉寂变得逐渐繁荣,米思及等诗人均有一定影响。80年代中期,于坚、海男、费

嘉等人登上诗坛,给云南诗歌创作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他们的作品与传统的云南诗歌有着明显的差异,最初并不被云南文坛认可,但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省内外更多的年轻诗坛歌者效法他们的创作。进入新世纪之后,雷平阳在全国诗坛异军突起。此外,李森、鲁若迪基、樊忠慰、哥布、艾栗木诺、爱松、祝立根等诗人的作品也都各具特色。云南在新世纪到来之后,改变了历来的文学“边地”身份,以诗人众多、诗歌的丰富多彩和巨大影响成为诗坛的重镇。在云南,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可能与诗人相遇。写过诗或者正在写诗的人太多了,哪怕在最偏远的县城,忽然间就有人找到你,送上一本他出版的诗集,或者他新近发表的诗作。

在云南这70年的诗歌发展进程中,公刘、白桦、周良沛、晓雪等诗人的重要性自不用说。相对年轻一些的诗人,比如于坚、海男、雷平阳等,也都呈现出鲜明的创作特色。其中,于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成为“第三代诗歌”的标志性诗人,他既有创作实践,也有理论的探索,用最平常的口语抒写普通的日常生活,倡导“回到常识,走向事物本身”。在人们看不见诗意的地方,于坚写出了他的诗,他刻意回避那些大词,从普通人中寻找与他的日常生活、普通人、平民意识两相吻合的方式,他重铸了诗性,在平白如话的口语中营造出令人回味的诗意。海男是一位有鲜明个性的诗人,是女性精神生活的执著书写者。多年来,她一直以前卫的立场、诗性的语言,探索女性个体隐秘的精神空间。尽管她的长篇小说和散文创作影响越来越大,但从未停止过诗歌的创作。诗集《忧伤的黑麋鹿》收录海男2009至2013年间的诗歌作品,勾勒出海男诗歌写作的精神轨迹。雷平阳的诗质朴、深沉、厚重,多以对具体景象的朴素叙述,引领我们复归大地与村庄,对细节的还原让我们原生态般地真切感受到生存与生命的状态。他对故乡总在追忆,也在写实,艰辛而不乏温暖,贫瘠中不忘德义。乡土、草根、地域,是其诗歌在题材层面的特征,而命运、疼痛、悲怆才是他诗歌内在的精神品质。《祭父帖》《杀狗的过程》《亲人》等作品均引起比较大的反响。

长篇小说创作有待加强

尽管70年来云南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然有自己的短板。近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成就不大,就是云南文学发展中的短板。在老一代作家中,有架构长篇小说的能手,李乔、彭荆风都在长篇小说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长篇小说放到全国平台上去衡量也并不逊色。但这些年来中青年作家中仅范稳在长篇小说方面成就突出,他对长篇小说创作深有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下功夫深入生活,积累创作素材。他的“藏地三部曲”是多年生活与艺术积累的结果,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但是,这样的作品在云南太少。中青年作家中,沉下心来、集中精力、花大功夫写长篇小说的人不多。一些作品操之过急,篇幅有余而内涵不足,艺术水平难以让读者满意,更难以在图书市场上产生影响。尽管获奖不是评价一部作品的惟一标准,但迄今为止,云南与长篇小说的重要奖项“茅盾文学奖”无缘,这对一个省的文学创作来说,不能不说是重大缺憾。

长篇小说创作,考验着一个作家全部的生活、思想与艺术积累,还考验着一个作家是否有沉静之心、耐得住寂寞。他需要用长达数年的功夫去磨一部长篇,写出一部经得起读者与时间法官检验的佳作。这确实很难,但又是一个有长篇小说创作理想的作家所必须做到的。对此,我们充满期待和信心。



■ 纪念

他的世界鲜花丛生

——悼念李进祥老师 □ 马晓霞

6月15日,李进祥老师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条信息:“我将回归清水河。”6月18日,传来了李老师逝世的消息,令人震惊。现在,他真的回到他的清水河了。

清水河是宁夏境内黄河水系的主要河流,发源于固原地区六盘山上,流经固原、海原、同心,至中宁泉眼山注入黄河。可以说,清水河流经了半个宁夏,清水河畔的人们热爱这条河流,也热爱书写这条河流的作家作品。李进祥是地地道道的同心县人,在清水河畔出生、成长,其文学上的许多光亮也来自清水河,因为他对清水河畔的人和事掌握得透彻而彻底。他著有长篇小说《孤独成双》《拯救者》《亚尔玛尼》、中短篇小说集《换水》《女人的河》《换骨》《生生不息》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写清水河系列作品的李进祥也多少有着清水河的品质,任河床浑浊也永远清澈流淌,和泥土相亲,匍匐大地,永远是低调的、内敛的,让人容易亲近的。他温厚待人,人们亦愿意温润对之。在他的作品中,人和事顺其自然地发展,顺其自然地发声。他疼惜和悲悯作品中的每一个内心向善的人,让他们尽量往好的方向发展,但绝不矫揉造作以求一个“好结果”,而往往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就

使小说充满了可读性。他的小说写的都是农村或市井小人物,故事跌宕起伏,人物命运走向令人唏嘘,引发读者深深的思考。比如小说集《换水》里收录的27篇小说,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牵动着读者的心。《女人的河》中,一辈子走出去都没有回来,一个没有什么家产和生活来源的年轻媳妇守着年老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子过日子,这种日子看不到头且没什么指望,但是阿依舍内心平静,既没大哭大闹,也没有想着离婚一走了之。她的善良和坚守,让人觉得她真的和一条河流一样,纵使奔向远方的路途荆棘密布,但是还要义无反顾地前进。虽然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大多命运悲惨,但是作者还是要给苦难的生活投进一丝光亮。如《狗村长》中,德成老汉在古稀之年本该享受天伦之乐,却只能一人孤独地生活着。他的孩子们只是偶尔回来看看他,再无人问津。他每天盼着有人来,但是每次都是无尽的失望。尽管如此,作者让一条狗走进了他的生活,虽然刚开始有些别扭,但好歹有个活物来回行走。这让读者深入思考凋敝乡村中的留守老人现象。

李进祥的小说有很多值得年轻作家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他始终关注平民,不管是清水河系列作品,还是探索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拯救者》,莫不如此。在《拯救者》中,作家多维度展开感情描写。对于女人的一生而言,无论她具备怎样的自身条件,都会怕所托非人。小说中的付云和袁茵,棕发女人和她的丈夫,长发女人和红夹克男,桃花娘和货郎,四个女人都是“瞎了眼”看上了根本不配自己的男人,结局自然是受到了伤害。可以说,对女性命运的思索,是其小说的重要主题。

在创作上,李进祥始终处于不断探索的状态。从清水河系列作品的农村人到《拯救者》中的城市人,从传统写作方法来尝试不同视角的多维度写作,他始终追求新求变。他从清水河来,却没有被清水河阻挡视线,反而极目远眺,顺势流淌,创作视野越来越广。在《四个穆萨》中,通过四个穆萨不同的身世描写和人生遭遇,表达了深切的人文关怀。今年2月,他在《民族文学》发表了长篇小说《亚尔玛尼》。在这部作品中,他书写了主人公六指在城市中的遭遇和困境,无奈之下只能返回乡村,可是这片残败的土地也无法给予他安慰。在这里,城乡并非是非二元对立的,而是相互混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锻造这样的性格和命运。小说书写了现代

人无处安放灵魂的彷徨感,以及或凶残或温暖的人性。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乡村,李进祥的创作也正好经历了一个“走出一返观”的轮回。

李进祥老师之所以为人称道,除了他的作品,还有他的为人处世。从走上文学这条道路起,他勤于思考,笔耕不辍,积极关心和帮助青年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在他的作品不断被人肯定后,他做了很多公益性文学讲座,和文学爱好者一起探讨写作的方法和技巧。在讲座中,他从不以师者自居,而是与听众平等交流,真诚而平和。作为宁夏作协的副主席,他和宁夏境内的绝大多数作家、文学写作者都认识,有些虽未曾谋面,只在网上交流过,但早已是熟人的感觉。他自己不断追求上进,同时竭尽全力去帮助中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很多人的成名作,都经过他反复修改,里面有的汗水凝结的露珠。如此,他亲手塑造出一个个不泯的写作者,继而是一个群体。他负责过好几届培训班的工作,每次都是自己跑前跑后,乐呵呵地善尽善地做好服务工作。为文学,他愿意竭尽所能。

李进祥老师在平时的生活中平易近人,从不强拉硬拽地把他的思想强加给别人。但一谈到文学,他又无比较真。他一方面鼓励中青年作家努力创作,另一方面又能拉下脸来批评那些懒惰者。听者也不会感到不舒服,因为大家知道,他这是出于文学的公心,他希望每个文学写作者都不断地往前走。

认识李进祥老师的人,都会对他有共同的评价:和他相处,永远会觉得舒服。他是值得信赖的人,为文如此,为人亦如此。如今,他离开我们了,但他的作品和人品会一直影响着人们。愿他的世界鲜花丛生。

